



老年日报



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

CN23-0018

邮发代号:13-18

中国百强畅销报刊
年长者的精神家园

总9841期
今日8版

2026/08/01 星期六 丙午年 六月十九

周刊

985不如110? 大学招生——

从名校溢价到编制溢价



“985不如110,清华北大不如警校。”这是句略显夸张的网络段子。

但是,当高考录取中,越来越多军警院校、公安院校、公费师范专业以及被民间称为“五大官校”的行业院校,投档线逼近甚至超过部分985高校时,这句话就不能只当成玩笑。

在江苏,有公安院校专业组的投档线与清华大学只差几分;在广东,多所军校热门专业组投档线突破600分;华中师范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公费师范专业持续升温;上海海关学院、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等非985高校,也在一些省份超过了传统名校。

当然,不同批次、科类和专业组之间不能机械比较。公安、军警院校还涉及性别、体检、政审和招生人数等限制。仅凭某个专业组的投档线,就断言警校已经“超过”清华,并不严谨。但数字背后的趋势十分清楚:传统的学校梯队,正在被就业预期重新排序。

1

过去的名校溢价,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

第一是品牌,名校文凭可以降低用人单位筛选人才的成本;第二是资源,包括更好的师资、同学、校友和升学机会;第三是选择权,一个人进入名校之后,可以继续读研,可以进入大公司,可以出国,也可以转换行业。

名校真正的吸引力,不是一份确定的工作,而是一组未来选项。它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发展上限,却未必能够保证他的人生下限。毕业之后,他仍然要面对行业周期、企业裁员、专业冷热变化和年龄门槛。

与之相比,军警、公安、公费师范以及一些行业院校,未必带来更高的收入上限,却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就业概率、更低的失业风险、更长的职业周期以及对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方面更稳定的预期。

数据显示差距非常明显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12.94万元,私营单位7.16万元,前者约为后者的1.8倍。科研行业差距更大,非私营单位18.21万元,私营单位仅8.36万元,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多。

所以,考生比较的不只是“哪所大学更好”,而是哪条道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更高:既要看成成功后能赚多少钱,也要看失败的概率和代价。

名校提供更高的“天花板”,编制提供更稳固的“地板”。当家庭越来越担心孩子跌落时,对人

生下限的重视,自然会压过对发展上限的追逐。

当然,“985不如110”并不意味着知识失去了价值,只是说明对于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,确定性已经比可能性更重要。

2

为什么这种变化会在今天变得如此明显?

原因并不神秘也不复杂,教育是一项周期极长、投入极高,而且很难重新来过的家庭投资。

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,家庭投入的不只是学费,还有住房、培训、陪伴时间以及父母为此放弃的其他机会。如果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,这项投资可能延续近二十年。

过去,家庭愿意承受这种投入,是因为他们相信,只要孩子进入一所好大学,未来收入和社会地位就大概率会有提高。名校文凭虽然不直接分配工作,却能提供足够丰厚的市场回报。

但是,当学历不断膨胀、行业变化加快、经济周期叠加企业经营波动的加剧,这种信念开始松动。

一个今天看起来热门的专业,四年后可能供过于求;一家令人羡慕的大公司,几年后可能裁员;一个三十岁时收入不错的岗位,到了三十五岁、四十岁,未必还能提供同样的机会。

另外,名校的出国路径吸引力也在下降。中美关系波动带来签证、就业等不确定性,而成本依然高昂。出国也变成了高投入高风险的选择,进一步放大了编制

的确定性价值。

人工智能也在加剧就业不确定性。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称,约四分之一岗位受生成式AI影响,文职和数字化岗位尤甚。AI未必直接消灭这些岗位,却会改变招聘数量、工作内容和技能要求。

当国内就业、海外发展和技术迭代同时变得难以预测,稳定岗位的吸引力自然上升。

每个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尽相同,对于资产充足的家庭,孩子即使第一次就业失败,也可以继续读书、转换城市、尝试创业。失败对他们来说,只是一次成本可控的试错。

但对普通家庭来说,教育投资一旦失败,很难再来一次,他们没有足够的资产,为孩子的长期试错埋单。

于是,志愿填报逻辑发生了变化。家庭不再单纯追求收益最大化,而是优先避免最坏的结果。他们宁愿牺牲一部分发展上限,也要提前锁定人生下限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高分考生选择公费师范、公安院校或者行业院校,看重的并不只是一种职业,更是一份由制度提供的长期保险。

3

过去,家庭把分数投入名校,是希望孩子获得更多可能;现在,他们把分数投入编制,是希望孩子少面对一些不确定性。

这不是年轻人突然失去了理想,也不是家长突然变得短视。恰恰相反,他们是在根据现实中的风险和回报,做出极其精确的计算。

面对这种现象,有人批评年轻人越来越保守,不愿意冒险,只想进入体制。

但如果一种选择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收入、更低的失业概率和更长的职业周期,而另一种选择要独自承担经济波动、企业经营和年龄变化带来的风险,那么人才向前者流动,就是必然结果。

人们会响应激励,而不是响应口号。你不能一方面让市场部

门的劳动者承担更多不确定性,另一方面又要求年轻人为了“理想”和“创新”,主动放弃更安全的道路。这不是鼓励奋斗,而是要求他人替整个社会承担风险。

真正值得关注的,是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的差距,为什么已经大到足以重塑一部分高分考生的志愿选择。

投档线就是价格信号,而价格不会说谎。

对个人来说,这是理性选择;但当无数个人作出相同选择时,就可能改变全社会的人才配置。

创新、科研和企业经营的共同特点,是结果不确定,真正的创新必然伴随着失败。

如果最有能力承担这种不确定性的人越来越早地退出竞争性领域,社会失去的就不只是几个创业者或者工程师,而是整个经济发现新机会、开辟新道路的能力。

高考志愿原本是教育分流,现在却越来越像职业身份分流。一个年轻人在十八岁时,就开始提前选择四年乃至六年后的工作岗位。

这固然能够减少风险,却也会压缩人生的选择权,使大学从探索能力、发现兴趣的地方,变成就业体系的前置环节。

如果一个社会不断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低风险部门,把经营风险、技术风险和就业风险集中留给市场部门,最终一定会付出代价。

因为一切稳定岗位,都建立在持续的财富创造之上。

编制并没有消灭风险,只是把个人的就业风险部分转移给了公共财政。一旦市场失去活力,企业利润下降,就业和收入增长放缓,财政所能提供的保障同样会受到约束。

从名校溢价到编制溢价,表面上是大学投档线的变化,实际上是社会对风险和未来的一次重新定价。

只有当市场中的长期回报重新有足够的预期,家庭才会愿意再次购买可能性,而不只是购买安全感。

张是之